

作为重复的阅读①

申屠云峰

(浙江工商大学 外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 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提出的作为重复的阅读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由于文本中的语言符号是自我分裂的,文本本源意义又先天缺失,所以任何阅读活动都是强行赋予文本某种意义的行为。值得反思的是,受到形而上学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米勒的这套阅读理论中隐藏着诸多与解构主义理论相脱节之处。

关键词: 米勒; 重复; 阅读理论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0)03-0106-03

Reading as Repetition

SHENTU Yun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Abstract: The main idea of the reading theory proposed by Miller in his Fiction and Repetition is that both the self-division of language in texts and the a priori absence of the meaning source work together to make reading as the imposition of a given sense on a text. It is well-worth reflecting that influenced by metaphysical dualism hidden in Miller's reading theory are his self-contradictions about deconstructive theory.

Key words: Miller; repetition; reading theory

对 J·希利斯·米勒这位享誉世界的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大家的代表作《小说与重复》历来有两种评价。一种认为:“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阐明了这些小说中为其他批评家所忽视的方方面面。”^{[1]1242}言下之意,该书仅是一般的小说解读与评论而已。另一种认为:“米勒对作品进行分析的同时,常常也提出一些解构主义的理论见解。”^{[2]145}这暗示该书中提出的观点是零散的。然而,我们以为米勒的这本著作有着一种内在理论性,即围绕“重复”这个中心提出了一种“重复”的阅读理论。

不过,《小说与重复》应该只能算是米勒解构主义批评生涯第一阶段的总结,其解构主义文论思想在此之后还有更大的发展。所以,接下来我们一方面要阐释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所展现的解构主义的重复阅读理论,另一方面我们要反思米勒在此阶段理论观点中的不成熟之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这部重要著作的思想精华,也才能

够借此较为深入地理解解构主义文论思想。

一、重复的本质——文本的自我解构

“重复”是全书的中心概念。虽然每个章节的研究对象不一样,但它像一根红线一样串起了各个章节。米勒对七部不同小说的研究都服务于“重复”这个理论主题。他坦承在对这些小说进行解读时关注的是“意义怎样从读者与书页上字词的相遇中产生的”。^{[3]3}而这种“读者与书页上字词的相遇”恰恰就是阅读活动最根本的现象。既然“重复”是全书的中心,米勒的关注点又是阅读活动,那么“重复”就应该是米勒对阅读活动的高度理论概括。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曾划分出两种重复模式:柏拉图式重复与尼采式重复。柏拉图式重复建立在固定的原型基础之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对这个自我同一的原型世界的模仿,因此彼此之间具有相似性。尼采式重复主张绝对差异,世界上万事万

① 收稿日期: 2010-03-12
作者简介: 申屠云峰(1975-),男,浙江建德人,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文文论。

物所呈现的相似性只不过是这种无法还原的差异所产生的幻象与魅影。显然,前者是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体现,后者则是反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而米勒认为,“虽然两者在根本上相互抵触,但彼此如影随形、无法分开,每一种重复都不可避免地召唤另一种重复,如它的影子般。你无法拥有一种重复而没有另一种重复。从这个角度看,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的差异就在于这两种重复模式相互交缠方式的不同而已”。^{[3]16}具体来说,虽然两种重复的预设是相互抵触的,但是柏拉图式重复是尼采式重复的基础,而尼采式重复又反过来早已寄居在柏拉图式重复之中而颠覆了它。显然,这两种重复模式相互交缠而难分难解的关系是一种反形而上学的非逻辑关系。这种非逻辑关系在文本中的表现就是文学文本的异质性,而“在文学和哲学文本中的这种异质性的理论假设就是所谓‘解构’批评形式的运作原则”。^{[3]17}所以,米勒所谓的重复就是这两种重复模式相互间的非逻辑关系,其实质在文本中体现为既支持又反对形而上学的文本自我解构性。在这个阶段,米勒对文本自我解构的论证无法令人完全满意。他在《小说与重复》中的论证有一个套路:先论证文本的形而上学表现,比如文本的某些方面表明文本有一个逻辑中心;然后再论证文本的反形而上学表现,即从文本的其它方面来推出文本并没有一个逻辑中心;然后便得出文本既支持形而上学又反对形而上学的结论。这种论证方式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文本的某些部分是形而上学的而另一部分不是形而上学的?若如米勒所说,“反柏拉图主义就在柏拉图中”,^{[3]16}难道这种形而上学文本中的反形而上学表现不应该贯穿文本的全部吗?如果按照米勒的这个论证思路,我们是否可以小心翼翼地切除杂质部分而获得纯粹的形而上学文本或纯粹的反形而上学文本呢?总之,我们认为在《小说与重复》中米勒对文本自我解构的理论说明比较雄辩,但在具体的文本分析实践中就显得比较机械,无法让人相信这两种重复形式完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还反映在其重复阅读理论的其它方面。

二、语言的本质——自我分裂的符号

在《小说与重复》中,米勒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两个基本特点:(1)符号无法抵达意义彼岸。无论是修辞语言还是概念语言,无论读者怎样努力,符号

意义的统一体或意义中心始终无法真正抵达。而且,只要存在人类意识和回顾性故事讲述的可能性,这种符号与意义统一体或意义中心的分离就已经发生了。(2)符号自身的分裂性。符号就像是原始的细胞,一旦是自我分裂的,它就不停地分裂下去以图获得重新的统一,可结果却是产生更多的进一步分裂下去的细胞。总之,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米勒在此的语言观,即自我分裂的语言符号在指向意义本源的同时又阻碍我们通向它。那么,这样的符号特性在具体的文本中是如何表现的呢?

具体到文本阅读中,米勒认为语言符号的这种自我分裂的双重性体现为语言自身内部的鸿沟,即“一个给定的词可能具有的字面意义和修辞意义、直接意义与反讽意义之间的不同选择”。^{[3]216}米勒的意思是语言的意义可以区分为本义与比喻义。本义产生于字面指涉功能,比喻义产生于对字面指涉偏离的转义修辞。虽然语言的这两种意义功能同属于某个语词,但转义始终阻止文本形成统一的本义,因为“转义的游戏留下了难以被同化的意义冗余或残余,使得意义的运动超越了任何统一性的边界”^{[4]175}。也就是说,一个文本中的词语同时既有支持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指涉义,又有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比喻义。虽然两种意义相互矛盾,但同属一体而难以分开,因此文本就体现为自我解构了。所以,语言符号自我分裂的这个特性在理论上支持了米勒关于文本自我解构的观点。

然而,尽管米勒关于符号双重性的理论似乎无可辩驳,但是他将符号的双重性在实践中变体为词语字面义与比喻义的关系却颇值得反思。按照米勒此时的观点,转义修辞所产生的比喻义是对字面指涉意义的偏离,所以总是能够阻挠统一意义的出现。但是,这个观点若要成立就要事先预设字面指涉意义的成立。这就等于一方面建立字面指涉义,一方面又建立与之对抗的比喻义,从而出现了字面义与指涉义的二元对立。然而我们知道,彻底的解构主义本身就是反对二元对立的,因为二元对立是形而上学的本质性特征。为了瓦解这种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解构主义要努力论证字面意义自身内部有了自我消解的力量,而不是靠其外部的力量来消解它。

三、意义的本源——在死亡的一边

除了语言符号自我分裂的双重性外,我们在阅读中无法抵达意义本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

义本源自身。传统的一种观点认为文学作品意义的本源应该是作者,作品是作者独特自我的传达。但米勒认为所谓自我只不过是语言功能作用的效果而已。传统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学作品意义的本源应该是外在的世界或社会,而米勒认为一切实体性的源头都是不可靠的。他认为意义总是以语言符号的形态出场,而符号的出场意味着意义本源的缺席,这种缺席就是“经验、意识、观看的死亡”。^{[3]167}米勒通过分析康拉德和伍尔芙的小说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伍尔芙和康拉德来说,光明与生活的可见世界是黑暗和死亡之不可见世界的镜像或颠倒的重复。只有前者可见和可描绘。死亡与语言不相融合,但通过谈论生活,我们可以间接地谈论死亡。”^{[3]178}这段话其实也表达了米勒自己的观点。在他那里,意义的最终源头就是死亡与黑暗。而语言只能间接地展现这个源头。

米勒认为:“现实、真实与完满位于镜子的死亡一边,而生活最多是那黑暗的现实之虚幻的、非实体的和碎片化的镜像”。^{[3]178}也就是说生活中一切鲜活的意义都只是那死亡的意义之源的虚幻反映而已。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反映意义之源的镜子是什么?很显然,米勒其实默认了语言文本就是那面镜子。这也许并不错。但是米勒给出的这个结构关系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依据米勒的说法,死亡(意义的本源)与生活(我们获得的暂时的意义)以语言为界分居其两端。死亡一端是无法测度的,而生活一端是可以测度的,两者有一种非对称的关系,因而不会形成对立的两极而陷于二元对立之境。但是,米勒的这个结构仍然暗示意义本源居于语言这面镜子的外部,而读者读出的意义其实在语言的内部。这样,米勒便很不巧地又落入了另一种二元对立:语言的外部与语言的内部。而我们知道,在真正的解构主义观点看来,正如德里达的名句“语言之外无一物”所示,我们无法真正地划分出语言内部与语言外部的界限,因为语言本身就是意义的源泉,死亡与黑暗也只是语言意义功能的效果罢了。我们以为,正如尼采式重复早已寄居于柏拉图式重复之中一样,其实黑暗与死亡也早已寄居在光明与生活之中,而语言恰恰就是两者共同作用的场所而并非一方反射另一方的明镜。

四、意义产生的模式——从已知走向未知

如果符号是自我分裂而无法指涉最后的真理,而意义的本源又阙如,那么我们是如何在阅读中获

得意义的呢?米勒认为对此问题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是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不确定论”(indetermination)。伊瑟尔认为,无论小说家如何努力来连接小说中的各个片段都无济于事,最后小说仍然是无法呈现固定的意义。因为,文本为读者提供的信息太少了,需要读者用自己的创造活动来填补空白,这样便允许存在不同的有效阐释。第二种是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所持的“武断论”(overdetermination)。在他看来,小说解读的问题在于所给出的信息太多而不是太少,而且所给出的信息之间又有很多是相互矛盾的,读者在作出某个解释的时候必须将一些信息弃而不用。这样不同的读者便会利用不同的信息材料得出不同的结论。第三种观点是杰弗瑞·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的“插入论”(interpolation)。根据这个观点,阅读就是在两个已知点之间形成的空白处填入某样东西,意义便自然会浮现。

米勒不同意这三种观点,因为他认为这三种观点都预设作品像七巧板一样是由固定的成份构成的。而事实上文本是由词语构成的,文本中语词之间的空白只能由语词自身来填补。但是,这种空白越填补越多,所需的语词也就越多。究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所谓的空白不是在语词之间而是在于词语自身内部。所以,世上最短小的文本也同时是既“武断的”,又是“难以决定的”。而米勒自己所主张的是推论法(extrapolation),即从已知的一点推向未知。具体来说,米勒认为读者在阅读中所面对的是彼此孤立的词语。这就是我们的已知。虽然这些词语都彼此毫无关系,但是早已建立的句法顺序的强制性力量促使读者来联接原本毫无关系的词语,填充它们之间的空隙,以获得完满的意义。所以这些原本孤立的词语排成一行时,意思自动就出现了。米勒由此得出结论:“所有的阐释都是通过某种方式将一个符号与它前后的符号相互交叉连接来设置模式。任何阐释都是赋予事件真实顺序的人为形式。在此过程中的意义来自于一种阐释者与被阐释者相互作用的行为(a reciprocal act),它们都对制造或发现一个意义模式起作用。”^{[3]144}

不过,细究米勒的这个结论,我们不由地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意义阐释的过程是阐释者与被阐释者相互作用,也就是说读者与语言的相互作用,那么这种关系该如何来理解呢?读者与语言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吗?

(下转第122页)